



未名社科菁华·国际关系学

权力·制度·文化

POWER,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

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第二版)

秦亚青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系统总结了
和探索,包
构主义等
创新性评介
领域的解
理论和社
现象的实
者的思想

了领域
表的几篇
两个方面
领域的研
自由主义
论所做
际关系
应用国际
具体国际
了一个中

行了领域
表的几篇
两个方面
领域的研
自由主义
论所做
际关系
应用国际
具体国际
了一个中

本书从理论
个方面系统
者在国际关
研究和探索
现实主义、
和建构主义
际关系理论
创新性评介和
中国国际关
说的解读和
及应 国际
和社会科学
林国际关系
益性研究,
个中国学者
式和学术探
第二版第
础上进行了
整,并增加
年发表的几篇
本书从理论
个方面系统
者在国际关
研究和探索
现实主义、
和建构主义
际关系理论
创新性评介和
中国国际关
说的解读和

未名社科菁华·国际关系学

权力·制度·文化

POWER,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

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第二版)

秦亚青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秦亚青著. —2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7

(未名社科菁华·国际关系学)

ISBN 978-7-301-27268-8

I. ①权… II. ①秦… III. ①国际关系—文集 IV. ①D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5918号

书 名 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第二版)
Quanli Zhidu Wenhua; Guoji Guanxi Lilun yu
Fangfa Yanjiu Wenji

著作责任者 秦亚青 著

责任编辑 徐少燕(shaoyan_xu@163.com)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7268-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62753121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6.75印张 449千字

2005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2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第二版序

《权力·制度·文化》是2005年出版的一本论文集,收入的文章主要涉及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重点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主要理论的评析。10年过去了,国际关系理论没有再出现成熟的重大理论。或许元理论时代已经过去,或许创建元理论的大师还没有现身,也或许元理论的沉默正是重大理论的孕育。

虽然没有出现重大理论,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仍在继续。具有创新意义的发展有着一个共同的关键词,即多元主义。多元主义主张拓展多元的理论视野,观察多样的经验事实,探索多维的理论建构方式。虽然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西方主流理论仍然是世界国际关系学界的主导话语,但多元主义已经开始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探索和发展的最重要特点。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三个趋向尤其值得关注。

首先是“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兴起。全球国际关系学建立在一种多元化的普遍主义之上,以世界历史为基础,而非仅是希腊罗马史、欧洲史或美国史,融合了地区研究、地区主义与区域研究。比较国际体系研究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这一研究议程的前提就是世界存在多种的国际关系体系和多元的国际关系历史。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经验基础是17世纪在欧洲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但是,纵观上下三千年,世界范围内绝不仅有威斯特伐利亚这样一种国际体系。单就东亚而言,就有着春秋战国时期的准国际体系、东亚的朝贡体系、日本的幕府体系等。国际体系的治理和运行也不仅仅只有威斯特伐利亚所建立和实施的秩序规则和制度机制。质疑欧洲中心主义,承认不同国际体系的存在并进行比较研究,就为新的理论突破提供了更为可靠的事实依据和更加开阔的思维路径。

其次,“文明与国际关系”也是当今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为国际关系理论多元化提供了文明史依据。文明研究议程质疑主流国际关



系理论依据单一文明发现国际关系规律的做法,主张世界是一个多元文明和多样文化的融合体,各种文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生了更加密集和频繁的互动。不同文明被视为多元现代化模式,多元活动进程或是多元实践场域,表现出多样治理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提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取向。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明比另外一种文明更具优越性,也不能用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去理解文明之间的互动,将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或是儒家文明对立起来的做法是错误的。一种文明的勃兴不在于将自己视为唯一具有文化内聚力和文明传播力的优势文明,而在于它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在于它与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和平发展的世界必然是一个多元文明互补互融的世界。

最后,“实践理论”成为具有重要潜力的理论取向。实践理论在知识论层面为多元主义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实践理论坚持实践本体论,以实践共同体为基本分析单位,认为人类社会有很多相似的经历,但也存在不同实践共同体,其成员的经历和日常活动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就会具有差异。承认多种实践共同体具有平等的本体地位,强调实践性知识是最根本的知识,重视不同实践活动的历史和现实存在,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知识只有在一种文明中才能得以产生的观点。二战后的欧洲是一个实践共同体,当今的东亚也是一个实践共同体,欧洲可以依其实践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东亚亦然。两者之间有相似之处,也必然存在差异。实践理论阐释了不同实践共同体的实践活动对于理论创造的重要意义,为多元理论的生产和再生产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权力·制度·文化》第二版仍以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论为两条主线,保留了第一版的主要文章,新收入的几篇文章主要是为了反映以上几种理论发展趋向,包括文明文化研究、实践理论和全球国际关系学。希望第二版以及这些新收入的文章能够对读者有一点启发和借鉴的作用。





光荣与梦想

——中国国际关系学 40 年（第一版序）

从 1964 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建立国际政治系至今，已经整整 40 年了。这 40 年记录了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成长的历程。经过几代国关学人的努力，中国国际关系学科有了长足的发展。今天，人大、北大、复旦都已经建立了国际关系学院，在校人数、课程设置、研究成果、师资力量都是 40 年前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回顾过去，我们走过了 40 年的光荣与辉煌。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关系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我们走过了更加辉煌的 20 年。

—

“四十而不惑”。我所理解的“不惑”，就是有了自觉。在这 40 年里，我们逐渐有了学科的自觉、学派的自觉和学术的自觉。

学科的根本在于独立的学理地位。学科的存在在于自觉的学科意识。即便是在当今各种学科相互渗透的发展态势中，如果要称得上一门学科，它依然必须具有独立的学理地位。1919 年，英国人建立了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标志着国际关系学科独立地位的初步确立。1964 年我国三大高校国际政治系的成立，则标志着中国国际关系学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它不再附属于其他学科，而是以独立的地位立于各学科之林。说我们有了学科的自觉，就是说我们意识到要建立这样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培养专门人才，生产知识成果。40 年来，这种意识愈来愈强，也越来越转化为中国国际关系的现实。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迅猛，除了三大高校之外，全国各地的高等学府的国际政治系和类似专业迅速建立起来，无怪乎有人将今日之国际关系学称为“显学”，在座



的各位大概也都有着对国际关系学科的高度认同,都认为自己是国际关系学科的学生和学者。

学派的根本在于独立的学理思想。学派的存在和发展在于学理的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国际关系学,较之于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分支,是后起的学科。学科初创时期,学派意识是十分淡薄的。从一战到二战的20年时间里,国际关系学只有一个学派,就是理想主义。因为只有一个学派,也就无所谓什么学派了。所以,在20年的危机时期,没有人对国际关系学进行学派分类。直到1939年,E. H. 卡尔的《20年危机》问世,这位英国学者将现实主义这一完全不同于理想主义的思想提炼出来,并将国际关系的理论分为乌托邦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学派。于是有了理论的对立。有了对立,也就有了学派。卡尔对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深刻批判为现实主义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对于英国学派第一代的领军人物马丁·怀特,人们至今仍将他的最大贡献视为对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创造性分类,因为他首先在卡尔的两大派的基础上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三大学派。看一下当今国际关系学主流理论三分天下的学派分野,就可以感悟到怀特分类的前瞻意识。我们也是一样。在1964年的时候学派意识几近为零,如今,我们厘清了外国的各种学派,从不同学派的论争之中得到了启迪,也认识到学派竞争对于推动学术前进的巨大作用。《欧洲》《世界经济与政治》等学术杂志推动了对不同学派的认知,加强了学派意识。不仅如此,我们现在也在思考怎样研究中国的问题,怎样创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派。这正是反映了学派意识的加强和学派自觉的深化。

学术的根本在于崇高的学术精神和学术理想。学术的自觉在于学术精神的执着和学术理想意识。学术是有系统的学问,学术精神是求真,学术的灵魂是学问背后的理想。国际关系学的建立是为了求真,为此,我们进行艰苦的探索和不懈的追求。使我深受感动的一本书是罗尔纲先生所写的《师门五年记》,因为它记录的正是这样的精神。不唯书,不唯上,只唯真,这是学问的精神。但是,仅凭学术精神还是不够的,在这种精神的背后必须有着学术理想的支撑。国际关系学的创建是为了消除战争,一战的血腥使人们希望通过建立一门学科的方式系统地思考怎样消灭战争和与之相关的丛林原则。从春秋战国、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到当今之世界,人类战争连绵不断。据考证,在有记载的历史上,战争的时间超出了和平的时间。因此,战争似乎成为人类事务中必然的事情,暴力似乎成为与人类共生共存的客观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关系学者的理想与



全人类的理想是一致的，我们希望消除战争的灾祸，也相信通过人的努力，我们可以对此做出贡献。这也许就是学术理想的自觉。

二

40年来，通过我们的辛勤探索和不断努力，我们产生、发展和巩固了学科的自觉、学派的自觉和学术的自觉。我们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汗水的结晶。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们的道路仍然相当艰辛、相当崎岖。

我们有了学科的自觉，但还未能建立起完备的学科。爱因斯坦说过，一个学科要具备两个要素，一是理论，二是方法。学科的完备意味着具有比较成熟的理论和比较系统的研究方法，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共同建构了学科的大厦。就理论来说，我们仍然在艰苦地探索着。就方法论来说，我们也仍然在努力建构，但是系统的方法和系统方法的使用依然是我们相当薄弱的环节。20世纪90年代末，我做过一个调查，根据结果，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仍然处于前实证阶段，因为国际关系领域缺乏认真的实证研究传统和研究方法。今天，从我们的大部分研究成果来看，从我们许许多多的博士硕士论文来看，研究方法仍然是一个重大但又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即便在重要的大学里，方法论训练也仍然处于很不完善的境地。

我们有了学派的自觉，但还未建立起原创性的学派。10年之前，有人将中国的国际关系成果视为“有一定深度的新闻报道”。现在，人们大约已经不再这样说了，我们与国际著名学者在学理层面的对话也越来越多。但是，作为学科重要标志的原创性学派却依然没有出现。我国的学者提出了许多建议和主张，有人说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有人说要表现中国的视角，有人说我们要创建中国学派。我本人也是主张建立中国学派的，但是，这不是一个说说就行的事情，需要十分艰苦的探索和实践。我以为，我们至今未能创立原创性学派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核心的学理问题仍然十分迷茫。“一切研究始于问题。”战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心在美国，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一直与美国的问题密切相关。霸权稳定理论、权力过渡理论、长周期理论、国际机制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等，无一不是围绕国际体系的领导地位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英国学派之所以成为影响日益增大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是因为英国战后的问题在于如何面对一个国际社会，而不是如何维持权力地位。所以，



我们必须厘清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核心问题，有学理意义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建立原创性理论。

我们有了学术的自觉，却仍需加强我们的学术精神和坚定我们的学术理想。要想写成一篇文章并不难，但是要写成一篇文章优秀的论文，实非易事。我有时与一些杂志的编辑聊天——我自己也承担着一本杂志的部分工作——编辑们常说，他们手头的稿件非常多，但是，真正优秀的稿件却是凤毛麟角。所以，既埋在稿件堆里，又没有稿件可用。我有时会自问：有多少文章是应景文章？有多少文章是经过认真的思考和小心的求证？有多少论文是为了应付一个又一个的研讨会？有多少论文是在一种没有浮躁、没有功利、平和寂静的心态下写出来的？有位中国学者曾经说过：“别人写过的题目我不会去写，我写过的题目别人不必再写。”这的确有几分狂气，有几分霸气，但是对自己研究的高度自信却正是建立在一种极度认真的学术精神之上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功利和浮躁是会毁灭学术精神的。

还有我们的学术理想。我们是为了什么在做学问？我们需要面对现实。如若无视现实，我们就会碰壁。但是，因为我们是人，所以我们必须有理想，没有理想，现实就会僵硬，思想就会贫瘠。国际关系学科的建立是与人们消灭战争、追求和平的理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这种理想，也就没有当今的国际关系学科。至今，这种理想不但没有泯灭，而且越来越强烈。令人担心的是，一时的现实会淹没永久的理想。当二战爆发的时候，人们开始挖掘人性之恶，将战争之源归于我们邪恶好斗的本性；当欧洲一体化进程受阻的时候，人们开始质疑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研究之后的理想。哈斯是新功能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欧洲一体化是新功能主义的试验场。欧洲一体化一度处于“动脉硬化”期，连哈斯也宣称自己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欧洲人度过了“动脉硬化”期，一步一步向理想迈进。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人之为人，他的能动性是可以使理想变为现实的；国际关系学人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国家实现理想的。

三

正因为如此，我就有了梦想。梦想我们有完备的国际关系学科，有争鸣的国际关系学派，有求真的学术精神和崇高的学术理想。而集中到一点，就是希望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莘莘学子之中，出现我们的国际关系



学大师。为了我们的学科,为了我们的学派,更是为了我们的学术精神和学术理想,只要付出辛苦,梦想是会成真的。

2004年6月笔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庆祝建院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
光

荣

与

梦

想
●





目 录

第二版序.....	(1)
光荣与梦想	
——中国国际关系学 40 年(第一版序)	(3)

理 论 篇

西方国际关系学	
——知识谱系与理论发展.....	(3)
权力·制度·文化	
——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	(14)
权力政治与结构选择	
——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评析	(26)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渊源	(54)
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	
——反思新自由制度主义	(87)
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	
——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	(112)
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	
——文化结构、文化单位与文化力	(143)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	
——读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155)
无政府文化与国际暴力	
——大国的强行崛起与和平发展.....	(166)



罗伯特·杰维斯及其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	(175)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	(193)
文化、文明与世界政治:不断深化的研究议程·····	(206)
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	(219)
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	(241)

方 法 篇

层次分析法与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	(251)
国际关系学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	(264)
实证主义与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281)
多边主义研究	
——理论与方法·····	(297)
第三种方法	
——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与人文的契合·····	(308)
霸权体系与区域冲突	
——论美国在重大区域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	(319)
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	(333)
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	
——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	(349)
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	(364)
全球学与全球国际关系学·····	(405)
后记·····	(413)
第二版后记·····	(415)



理 论 篇



西方国际关系学

——知识谱系与理论发展

内容摘要

一个学科的知识谱系至少包含了该学科的研究主题和发展宏线这两个因素。在过去 30 年里,西方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的研究主题是冲突与合作或曰战争与和平,推动知识生产并构成学科发展的宏线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派体系理论的学理论战。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对合作研究的力度加大、社会学理论影响的增强和人文意识的加重等特征,但以西方尤其是以美国为重心的现象并没有减弱,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怎样才能得以建构是需要深思的问题。



在知识发展史上,任何学科都有着自己的知识谱系。所谓知识谱系,就是一个学科中知识发展和变化的系统,表现了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知识谱系是一个历史谱系,显示了知识的诞生、成长、发展、进步、转换、革命。要把握一个学科的整体发展脉络,就需要了解它的知识谱系。

一个学科的知识谱系至少包括两个要素。首先,知识谱系必须表现学科发展的主题,即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任何一个领域的知识的集合,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学科,必然有其自身的特征,亦即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内容。比如,现代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资源稀缺社会中的商品生产、分配和消费问题,其主要理论发展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一主要内容产生的。再如,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社会发展和社会行为,尤其是社会秩序、正义、稳定、发展和变革等重大问题,社会学的主要理论也是围绕这样的主题展开的。其次,知识谱系必须表现学科的发展宏线,即以重大理论为里程碑的理论发展轨迹。任何知识谱系都有着连理贯通的思想和理论发展宏线。把握了这一宏线,就可以全面了解一个学科的知识谱系,就可以便利知识的系统积累,推动知识的有意义创新。在学科的知识谱系之中,必有一些知识结晶,构成谱系的支柱,亦即发展宏线上的里程碑。它们是原创性的学理思想,既能够启迪常规性的科学研究,又能够激发革命性的学理挑战。正是这些知识结晶的不断出现和相互竞争形成了学理思想的发展,编织了知识发展的宏线。比如孔德的实证主义理论、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和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等就是西方古典社会学中里程碑式的理论。

知识谱系的传承与发展依赖于生产知识和推动知识发展的知识力。这种知识力来自竞争和借鉴,突出表现是新兴理论对原理论的突破性发展。根据库恩的科学哲学理论,一种源头性创新理论的产生往往会确立一种新的范式,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和牛顿的运动定律。这是知识的生产。新的范式确立之后,会出现大量常规科学研究,即对新的理论范式的证实与证伪性验证。这些研究本身并不会产生新的科学体系,但却起到了知识延续的作用。在这种延续过程中,人们会发现与主导理论相悖的现象,于是便会提出新的理论。新的理论逐渐发展为比较完整的新范式,并与旧的理论范式展开竞争,竞争形成知识力,竞争促成了旧范式的衰落



和新范式的兴盛,推动知识的再生产。^①从某种意义上讲,波普尔的证伪理论也是将竞争和批判作为知识力的基本来源。^②竞争的关键是新的理论对原有理论的关键性突破,亦即提出原有关键概念和命题不成立的合理论断。竞争的确是知识谱系发展宏线的重要动力,同时借鉴与融合也是知识力的重要来源。孔德曾经说过:“科学和艺术领域的一切成就,无论是同一时代的,还是代代相传的,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是一代人的发现为另一代人的发现准备好了条件。”^③拉卡托斯对知识发展的基本认识是新的理论是包容旧的理论的知识体系,是具有超于内容的理论。^④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谱系中推动理论发展的另一种动力是理论之间的相互借鉴与融合。所以,理论之间的竞争可以推动知识的再生产,理论之间的借鉴与融合也可以成就知识的传承和发展。在许多情况下,竞争与借鉴是共存的。

二

国际政治学也像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从上个世纪初成为一门学科以来,逐渐呈现了自己的知识谱系,出现了一条国际政治理论发展的宏线。我们仅从战后西方国际政治学的简短历史中就可以发现,这一知识谱系的主题是冲突与合作,或曰战争与和平,发展宏线是从现实主义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轴逐渐发展为当今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三足鼎立的局面。

也许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和冷战的恐怖给人们留下了太深刻、太沉重的印象,所以战争与和平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永恒主题。国际政治学者希望发现冲突与合作的原因,揭示战争与和平的规律,考虑怎样才能减弱、克服和超越冲突,能够更加积极地合作,求得共同的安全。国际政治学的不同理论和学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展开讨论和进行研究的,它们之间的争论也大多涉及合作与冲突的原因、内涵和意义。政治现实主义主导西方国际政治研究达三十年。从1948年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发表,到1979年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问

①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 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③ 转引自侯钧生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④ I. 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

